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欧贸易谈判：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带一路五周年，评述与展望

中国国企暂缓全球化步伐

私人债务的公共成本

2019 年全球经济预测

面对经济改革，中国不能再优柔寡断

本期编译

安靖宜

李芳菲

凌枫

史明睿

宋海锐

吴克谦

王梦瑶

杨茜

张舜栋

张子萱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张寒堤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欧贸易谈判：一项艰巨的任务 6

美国与欧盟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与美日贸易协定相比，美欧贸易谈判目标更不平衡。美国寻求与欧盟的单向贸易，再加上对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地理标志等相关农业问题的要求，跨大西洋协议达成几乎没有希望。

无协议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准备好了吗？ 8

作者依据一份为德国联邦议院欧盟委员会编写的说明，探讨无协议脱欧对欧盟的可能影响，评估欧盟方面的准备工作，并根据英国的选择为欧盟提供最佳战略指导。

一带一路五周年，评述与展望 9

中国自 2013 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抓住全球化机遇的重要方式之一。受制于目标过于宽泛、执行不够透明、缺乏尽职调查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乃至全球发展的战略构想或将无法实现。本文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及政策意图，探讨与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地域范围、国有企业、资源配置、透明度和尽职调查相关的倡议内容，明确了缺乏优先事项和债务超载问题阻碍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并提出，通过明确目标、提出有选择性的可行计划、尽职调查、良好地沟通、引入多边放款人、评估项目成本和风险等方面的改进或将有助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更好地从投资中长期受益。

聚焦中国

中国国企暂缓全球化步伐 19

2018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速度显著放缓。作者全面总结并分析了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及在海外承包工程的分布情况，并对美国政府给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23

中国数字化经济在世界处于中间水平，但在关键行业中国是数字行业领导者，如电子支付、电商服务、云储存、ICT 出口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益于用户需求、政府支持、规模优势。而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与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再平衡、改变市场结构与不平等现状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本文也对中国数字化经济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

中国 2040 年人口形势展望 27

目前已经可以对中国 2040 年的人口状况有相对可靠的预测。在数量方面，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并在此后加速下降；在年龄结构方面，65 岁以上人口将呈爆炸式增长，老龄化迅速。这些趋势预示着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

战略观察

2019 年全球经济预测 30

本文为 2019 年欧洲、美国和亚洲的经济表现展望。文章首先回顾了对欧元区的评论和预测，许多评论人士预计，由于不确定性继续抑制依然强劲的复苏，欧元区的表现将低于潜在水平。此外，其他地区经济也各自存在风险。

私人债务的公共成本 33

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公共债务积累的危险得到了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私人债务的过度积累却很少受到关注。本专栏记录了一种未被关注的私人债务的化解方法。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债务的反周期增长转移私人债务，缓解家庭与企业个体的债务压力。即使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转移也在不断地进行着。

历史终结的终结？ 36

作者认为，历史的终结在二战后即 1945 年就到来了，因为在那之后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小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而特朗普当下带领美国从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的自由世界秩序中撤退，则意味着这种“历史的终结”的终结，最坏的结果是世界重回历史——繁荣与萧条的古老周期和频繁的重大战争。

面对经济改革，中国不能再优柔寡断 38

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行动比话语更重要。共享繁荣和经济持续改革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巩固党的合法性、确保党生存的必由之路。

本期智库介绍 40

美欧贸易谈判：一项艰巨的任务

Gary Clyde Hufbauer 和 Zhiyao (Lucy) Lu/文 杨茜/编译

导读：美国与欧盟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与美日贸易协定相比，美欧贸易谈判目标更不平衡。美国寻求与欧盟的单向贸易，再加上对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地理标志等相关农业问题的要求，跨大西洋协议达成几乎没有希望。编译如下：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团队已经开始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五年前，当奥巴马政府和欧盟试图缔结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TTIP) 时，谈判未能解决农业、政府采购和商业服务方面的分歧。美国政府最近公布的美国—欧盟贸易谈判目标表明，跨大西洋贸易协议将更加难以实现。

美国贸易代表 (USTR) 发布了与去年 12 月宣布的美日贸易协定 (USJTA) 相似的目标。但事实上，美欧贸易谈判目标更不平衡，谈判将比五年前更加艰难。第一，美国之前根据“232 条款”对来自欧盟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并威胁对欧盟的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第二，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很多新限制；第三，现任美国总统只喜欢让对方进行贸易让步。。此外，罗伯特·莱特希尔大使 (受参议院财政主席查克·格拉斯利的支持) 坚持将农业纳入目前的谈判，欧盟明确拒绝了这一议题，此外，美国还要求欧盟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以及地理标志等相关农业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些行为使得美欧贸易谈判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更艰难。欧盟贸易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罗姆声明，要求新的美欧贸易协议仅限于工业产品，并建议签订零关税协议，但这一提议并不符合特朗普总统的意愿。

美国、欧盟谈判目标中的大多数内容与美日贸易协定相同。单向管理贸易的特点散布在整个美欧谈判目标中。包括减少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逆差，美国工业品的免税市场准入，但没有提及美国的关税自由化，以及消除欧盟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壁垒。与此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更密切地审查对美直接投资项目，目标将确保美国公司可以向欧盟政府机构出售产品，同时维持“购买美国货”计划，这一项计划将把欧盟公司排除在外。欧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单向让步，因此任何跨大西洋交易都不太可能变得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目标相似。

与美日贸易协定的谈判目标相比，美欧贸易协定的谈判目标更加重视欧盟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这并不奇怪：欧盟在农业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方面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一大心病。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起了若干针对欧盟的农业投诉，其中包括 1996-2009 年的牛肉激素案例，美国对欧盟禁止在某些牛肉中使用激素的做法持反对态度。2003-2008 年，关于转基因生物 (GMOs) 的另一起争议集中在美国对欧盟特定生物技术产品进口审批程序上。2009 年，美

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的家禽问题也存在争议。展望未来，美国希望欧盟在颁布可能抑制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新法规之前，先解决美国担忧的问题。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希望欧盟停止通过强制采取欧洲 SPS 措施来阻止美国向第三国市场的出口机会。

另一个谈判中涉及的农业领域问题是地理标志（GI）的保护。如奶酪、葡萄酒、火腿和其他产品有关的特定名称，这些名称往往表明了产品的地理来源并暗示了他们的声誉和品质。作为大多数地理标志的所在地，欧盟一直在推动其贸易伙伴在国内立法中给予更全面的地理标志保护。美国将欧盟的努力视为阻止美国产品对国外市场出口的一种手段。例如，Feta 奶酪在欧盟范围内是一种地理标志产品，它被认定为仅在希腊生产的商品。根据欧盟的地理标志相关规定，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klondike 奶酪公司不允许在欧洲或承认欧盟地理标志规定的第三国销售 Feta 奶酪，美国生产商必须更换产品名称，否则就是侵犯知识产权。美国不愿意在地理标志问题上对欧盟让步。

美国寻求与欧盟的单向贸易管理，再加上对敏感农业问题的要求，跨大西洋协议达成几乎没有希望。乐观情形是谈判围绕零工业关税，商业服务和数字贸易展开，并相互让步，并在棘手的农业问题上双方能适度讨价还价。当然，这些问题欧美双方已经争论了 50 多年。

本文原题为“US-EU Trade Negotiations: A Daunting Mission”。本文作者 Gary Clyde Hufbauer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曾担任雷金纳德·琼斯高级研究员，Zhiyao (Lucy) Lu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无协议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准备好了吗？

Guntram B.Wolff /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作者依据一份为德国联邦议院欧盟委员会编写的说明，探讨无协议脱欧对欧盟的可能影响，评估欧盟方面的准备工作，并根据英国的选择为欧盟提供最佳战略指导。编译如下：

总的来说，无协议脱欧将在短期内造成破坏：

首先，欧盟的贸易方面将马上面临极大的管理和后勤挑战。虽然减轻破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但仍远远不够。不过，尽管最惠国关税将对某些部门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德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其次，如果英国不履行其对欧盟的财政承诺，欧盟在当前预算期的剩余时间内将损失约 165 亿欧元。不过，现有的“自有资源”上限可以填补这一缺口。“脱欧法案”总的损失金额将达 450-500 亿欧元。

再次，欧盟可能将不履行财政承诺视为违约，并可能导致不合作的无协议脱欧，这将比合作下的无协议脱欧更具破坏性，因为在合作下的无协议脱欧中，欧盟和英国尚可在一些紧急文件方面进行合作。

最后，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法规草案，以减轻无协议脱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航空和签证等问题。这些措施都是综合性的，但依旧不会抵消无协议脱欧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无协议脱欧在某些领域会造成严重破坏。

从中长期来看，无协议脱欧的影响很难评估，无协议脱欧可能将导致政治关系的长期恶化，而这将降低未来新的贸易安排和其他合作的可能性。

爱尔兰的局势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它也是脱欧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如果欧盟想要保护其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无协议脱欧意味着爱尔兰边境将实施海关管制。欧盟委员会的立法草案旨在维护和平进程，但是一个硬边界可能会引发新的暴力冲突。

欧盟应采取的总体战略方向是，尽可能增加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成本（尊重道德限制），同时在政治宣言和可能的退出协议本身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本文原题为“The Implications of No-deal Brexit: Is the European Union Prepared?”本文作者 Guntram B.Wolff 是 Bruegel 的董事。他的研究重点是欧洲经济和治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金融。他拥有波恩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匹兹堡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教授经济学。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一带一路五周年，评述与展望

Michael Baltensperger, Uri Dadush /文 李芳菲/编译

导读：中国自 2013 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抓住全球化机遇的重要方式之一。受制于目标过于宽泛、执行不够透明、缺乏尽职调查等，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乃至全球发展的战略构想或将无法实现。本文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及政策意图，探讨与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地域范围、国有企业、资源配置、透明度和尽职调查相关的倡议内容，明确了缺乏优先事项和债务超载问题阻碍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并提出，通过明确目标、提出有选择性的可行计划、尽职调查、良好地沟通、引入多边放款人、评估项目成本和风险等方面的改进或将有助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更好地从投资中长期受益。编译如下：

1、导言

过去的四十年间，在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飞速发展和自由化政策的推动下，世界贸易在各国的发展战略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贸易额全球占比日益提升；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达 40% 以上。与此同时，2016 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消费品仅占比四分之一，而初级商品、零部件和资本品贸易总额所占比重则高达四分之三，并为复杂的国际生产网络——所谓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相应的资金（UNCTAD, 2018）。国际生产网络主要围绕三个中心区域展开：中国、欧盟（以德国为中心）和美国（World Bank, 2017）。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助于各国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消费者则能够从较低的价格和增加的产品种类中获益。

为抓住贸易全球化优势，巩固国家关系、保障国家安全，中国、欧盟和美国政府均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近邻经济一体化，且发展路径各有不同。欧洲共同体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逐步壮大，最终成为由 28 个国家共同构成的欧洲联盟。欧盟目前已实现了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口在领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并与东欧、中东、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数十个近邻国家缔结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涉及援助、贸易及政策协调。而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则更侧重于国际贸易方面，由美国主导，几乎涵盖了北美洲、中美洲和除阿根廷和巴西以外的南美洲所有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为提高在汽车、电子和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拓宽其合作范围，逐渐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

2、什么是一带一路倡议？

欧盟和美国均以不同的方式缔结贸易合作伙伴，中国的经济外交也并非被动。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对外开放已 40 周年。早在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前，中国已签署了约 20 项贸易协定，与 15 个亚洲国家就区域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缔结了约 100 项双边投资条约，制定了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计划，设立了两家国

际开发银行，成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主要投资者。经过长期谈判，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也发挥了日益积极的作用。2016 年，人民币被列入特别提款权五种货币之一。

在众多国家经济举措中，一带一路倡议（BRI）来得并不算早，却最为雄心勃勃，仅五年时间，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已与全球近一半的国家建立了经济关系。其最早于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发表讲话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以贯彻始终，并成为中国和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 100 个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基础。回顾古代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五点计划：

1、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联合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的政策磋商；2、改善道路连接和运输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带的建立（由此得名“一带一路”）；3、减少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4、“货币流通”：包括出于贸易和投资目的的货币可兑换，及相互接受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的作用日渐增强；5、增进包括学生、游客、研究人员及各领域专业人士在内的人员交流，分享知识、增进理解。

习近平还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外交政策一样，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至关重要：“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互不干涉内政”。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商业主张，并无类似于宏观经济失衡及治理等相关附带条件，也不意味着建立联盟。

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动机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外交政策相似，巩固友谊，抓住商业机会；然而，在设计和执行上，一带一路倡议则均有所不同，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和中国领导人的全球观。

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更为强调对基础设施和贸易便利化（即“连通性”）的投资，致力于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府白皮书中（发改委，2015）曾指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重点关注关键通道、枢纽项目，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增强通关连通性……应推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民航全面合作平台和相关机制……”。部分前期项目也一并归入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规模非常庞大，包括了雅加达和印度尼西亚万隆之间 31.9 亿美元的高速铁路连接项目、塞尔威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之间价值 30.4 亿美元的铁路连接线等。除交通运输项目外，一带一路倡议还包括了能源和工业设施建设项目，如：巴基斯坦总计逾 65 亿美元的核反应堆项目；巴基斯坦总额 57 亿美元的水电项目；中国国家电网在巴西能源基础设施方面 22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以及肯尼亚经济特区 20 亿美元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为其在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即道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发电站和电网）的专有技术和卓

越的运营能力找到了新的出口。据经合组织钢铁委员会统计，2006-2015年间，中国钢铁产能翻了一倍多，已占全球钢铁产能近一半，但全球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却从80%降低到70%。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缓解过剩产能问题。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中国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同西部、南部和北部邻国间及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和国家间的联系。青海和新疆等西部省份人均总产值仅占北京和上海人均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通过这些地区纳入全球市场，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

第三，包括中国石化集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中国铁路建设总公司等中国国有企业主导了一带一路倡议交易项目，其竞争性外部采购需求不大，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作为其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有时并不高，但它们往往有着境外项目运营经验、规模、融资、低成本劳动力、大型工程建设能力以及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承担能力，并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获得长期发展。这些国有企业主要以利润为导向，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融资；当然，在必要时，这些国有企业也可以由政治目的驱动。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项目评估，不仅包括了内在的盈利能力评估，还囊括了更为广泛的国家意志，如促进贸易、改善原材料获取、稳定就业等。

第四，随着国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需要海外网点来消化其巨额国内储蓄。截至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6.5%-7%之间，经济增速大幅减低并未伴随着国内投资率的下降，而是从GDP的41%攀升至GDP的45%左右，这一事实意味着国内投资效率急剧下降。

第五，与几乎其他所有大型双边和多边发展融资提供者不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几乎没有诸如社会环境和财政可持续性等相关保障措施。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一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人权、民主和治理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很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和美国不同，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而非贸易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协定就能够被忽视。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大力推动全球协议网络的建立，这些协议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互补，以求达到协同效应。在中国签订或即将签订贸易协定的44个国家中，有29个是一带一路倡议参与者，其中有16个国家已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几乎所有的贸易协定都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前开始了谈判，并有部分已经达成。然而，在这16个有贸易协定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中，有14个国家开始谈判修改深

化贸易协议。此外，有 10 个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此前与中国并无贸易协议，而目前正在进行贸易谈判；另有 3 个参与国目前正在考虑贸易协定相关事宜。

中国与 29 个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贸易协定影响相当显著。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贸易总额已大于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总额。此前中国已在其两个主要出口市场（即美国和欧盟）享受最惠国待遇，适用税率贸易加权平均值为 0-3%，这一待遇目前也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实现，以基本实现不受阻碍地进入全球市场。

除旨在促进贸易、增进各国间了解以外，一带一路倡议还相当关注人口的临时流动。中国已经是西方国家海外留学生和游客的最大来源国，2017 年中国留学生人数达 84.7 万人，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9 个国家留学生超 43 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和游客在一带一路倡议国中占比同样也很高。2016 年，中国接待了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国的 20 多万名留学生和 100 万名游客（中国国家统计局，2018）。

3、市场缺口

出于安全和地缘政治等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各方有理由同中国建立联系。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既是恐惧的来源，同时也是充满吸引力的所在。仅从商业角度考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使得众多国家无法拒绝。

首先，中国作为进口商的崛起是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大动力。2017 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高达 22,08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欧盟（不包括欧盟内部进口），位列全球第三。自 2007 年以来，中国进口年增长率 8.8%，而美国则为 3.9%，欧盟（不包括欧盟内部进口）仅为 3.2%。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降低，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35% 降至 20%，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9.9% 下降到 1.4%（世界银行，2018a）。中国已不再被视为廉价进口商品来源国，目前是巴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等 20 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2016 年有 48 个国家对中国存在商品贸易顺差。中国贸易平衡反映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制造商和组装者的作用——初级产品贸易逆差和制成品贸易顺差。同中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提供原材料（特别是石油，也包括农产品、金属和橡胶）、集成电路或液晶显示器等电子元件（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及那些提供高端机械和高端消费品的国家（如瑞士）。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谈判中占有很大优势。与中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则是那些拥有最大消费市场的国家：美国、欧盟和印度。它们是最公开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第二，中国已成为大型外国投资者和资金提供者。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 270 亿美元增至 125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位居全球第四，对外资产从 2007 年的 24,160 亿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69,260 亿美元，也因此迅速成为排名全球第八的大型外国债权人（IMF，2018）。尽管难以获得精确的统计数据，但部分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当前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例如，Jayaram 等人（2017）估计，除了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贸易总额增长了两倍以外，还是非洲第一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提供者、第三大援助提供者，此外，尽管是后来者，但已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国。

第三，就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一项基础设施安排而言，其满足了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全球基础设施展望》（2017）指出，未来几十年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有一半以上发生于亚洲；到 2030 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要 21 万亿美元。将以上需求与当前投资趋势相比较，该展望指出，截至 2030 年，亚洲的投资缺口将高达 3.3 万亿美元，其中，电信项目投资缺口 1.4 万亿美元，能源项目投资缺口 0.9 万亿美元，交通和水利项目投资缺口 0.5 万亿美元。仅在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就高达 2750 亿美元。单从数字来看，相比于世界银行集团（2018b）向南亚、东亚、太平洋沿岸及欧洲、中亚提供的贷款总额 185 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 2017 年联合业务总额高达 290 亿美元。非洲大陆和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较小，但投资缺口却很大，分别为 2 万亿美元和 3 万亿美元（全球基础设施中心，2017）。

在治理薄弱、宏观经济与政治环境不稳定、公共财政脆弱的环境中进行长期投资风险高、回报不确定。受此因素及其他原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多边开发银行也不得不吸取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置多种限制条件，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1、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有关的保障措施；2、与治理和宏观经济稳定相关的条件；3、与项目可持续性有关的条件；4、与采购有关的程序，如要求公开竞标。

对腐败决策问题高度关注是以上保障措施能够得以实行的基础。然而，尽管许多预防措施必不可少，但其或将导致项目的设计、批准、执行周期非常长。例如，世界银行所有项目（不仅仅是基础设施项目）从董事会批准到项目完成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5.6 年，且还不包含项目准备期。对于基础设施项目而言，整个项目周期可能需要两倍的时间。显而易见，对于亟需水、道路、电力的地区以及迫切需要在选举周期内响应需求的政治家们，更希望能拥有一份能够迅速解决众多障碍的提案，从而避免复杂的采购规则和多个供应商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四，首次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只需要签署一份简单的机密谅解备忘录，约 4-5 页。该谅解备忘录要求相关国家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根据倡议框架确定可能的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而在随后的项目细节中，通常要求政府担保和抵押品质押。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将给各国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而非仅仅通过特定项目或交易来改善中国的“连通性”。也正是因此，众多国家热情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从中亚到东南亚、南亚，再延伸至东欧、南欧、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东非，再到最新的拉丁美洲，短时间内，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双边经济外交的试金石、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并成为习近平主席的标志性举措，2017 年，中共十九大将一带一路倡议写进了党章。

4、早期问题评估

虽问世不久，但五年的时间，已有足够的信息来对一带一路倡议做一个初步的评估。随着有越来越多一带一路的相关项目数据可用，将来可对其进展进行更为严格的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响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并为进入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市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途径。然而，仍有众多观察员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日本、欧盟、美国政府尤甚。在本节中，我们将真实反映那些被误解和被夸大的相关问题，并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真正的问题所在。

(1) 地缘政治

许多批评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真正的贸易或发展倡议，而是中国为扩大影响力而事实的举措之一。这一指控部分属实，却并不正确。从马歇尔计划到欧洲煤钢共同体，再到命途多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无疑都受到了地缘政治、安全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的共同推动。中国制造 2025 计划中将高科技行业的领导地位作为目标，与德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进行直接竞争，并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市值最高的二十多家高科技公司仍主要为美国企业，但中国数字领域和其他行业公司在研发支出方面正迅速赶超欧美技术领先企业（Veugelers, 2018）。毫无疑问，中国的强大实力和崛起速度对现有其他大国形成了挑战，且美国和欧盟正处于防御性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所获得的互联互通对其并无帮助。美国政府采取了保护主义，而欧盟还在英国脱欧、整个欧洲大陆民族民粹主义盛行中蹒跚前进。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发美国和欧盟的担忧，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宣称中国没有野心去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2) 目标和优先事项

目前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协定已为我们所熟知，利益相关者可以选择接受或反对协议中的特定条款；同样，世界银行的贷款方式和相关条件也已被清楚地阐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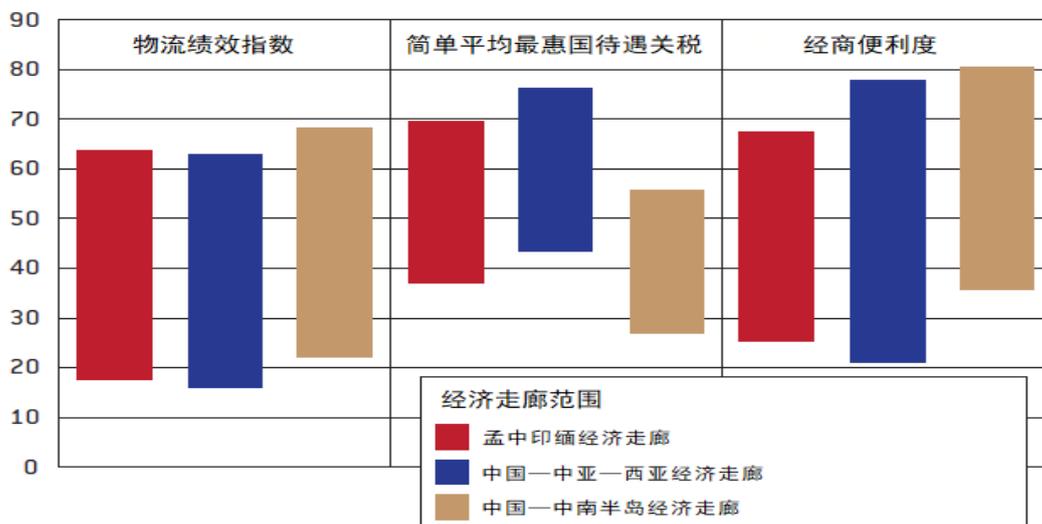
与此相反，自习近平主席的阿斯塔纳演讲开始，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就相当广泛，形式则并不确定。部分观察家称其为“中国方式”、实用主义，但事实上，其反映了中国在协调众多海外企业方面面临的困难。也正是因此，众多国内外人士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范围感到困惑，世界银行、全球发展中心 and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国际观察员将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在跨大陆范围内改善区域合作和连通性的雄心勃勃的努力”、“庞大的投资计划”或是作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融机构”。在 2015 年白皮书（国家发改委，2015）中，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确定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目标不够明确带来了负面的政治影响，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下定义。此外，其还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成本，一带一路倡议的执行并无明确的优先发展事项需要遵循，或将存在相关负责人可以随意挑选最符合其自身利益项目的隐患。

（3）地理范围

当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都未能有明确的阐述，其地理范围更难以确定。在 2015 年的白皮书中，一带一路倡议被描述为覆盖、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区，向所有国家和地区、国际和区域组织开放，通过共同努力使更广泛的领域受益（发改委，2015）。据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中国同其他 65 个国家相联系，这些国家的 GDP 约占全球 30%、人口占比近 62%、已知能源储备占比达 75%（世界银行，2018c）。据测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已达三位数。即使是规模最大的发展计划，往往也会针对特定地区或国家（如最不发达国家），并制定优先事项，而不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

图 1 同一经济走廊内的国家在物流绩效、贸易政策和商业环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4）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倡议各国即使同处一个经济走廊，也难以确定其共同议程。显然，巴基斯坦、缅甸、中亚和东非等贫穷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发展的捷克共和国、葡萄牙和希腊等欧盟成员国的需求将会存在天壤之别。同一经济走廊内，有的国家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而有的国家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此外，其物流状况、贸易政策自由度、商业环境也各不相同（图 1）。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群体，一带一路倡议并没能明确其优先发展顺序。

（5）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低成本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受益于政策补贴，缺乏预算约束，国内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对供应商或客户享有特权，同时还有隐形或显性国家担保及各种非透明补贴。此外，国有企业往往也可倾向于选择中国供应商，其涉及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包括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上文所提及的高科技产业。

如果中国企业退出了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企业又是否能够取而代之？世界银行对国际竞争性招标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了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在工程建设、设备供应、项目设计等方面已超越西方企业并占据主导地位。2007 年，世界银行境外项目 5.5% 的资金被授予中国企业；2017 年，这一份额已占中国境外采购项目总成本的 36%。中国企业当前主要面临的是来自于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如前所述，很少有民营企业愿意承担中国国有企业所承揽的高风险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也许这也正是各国政治家纷纷谴责一带一路倡议而民营企业却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所在。

（6）资源分配

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也饱受批评，主要反对意见在于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落后地区亟需更多的投资建设，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更像是一种资源浪费。Dreher 等人（2017）估计，中国政府自 2000-2014 年间提供的官方融资总额高达 3500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在此期间 GDP 的 0.5%；同期美国政府提供的发展援助资金总计约 3600 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失为一笔巨款。

然而，事实上，中国这 3500 亿美元的支出中包括了出口信贷和以市场利率计的延期贷款。Dreher 等人（2017）进一步测算了官方发展援助条款所涉及的财政拨款，认为 2000-2014 年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至少为 750 亿美元，与同期的荷兰的发展援助支出相近（经合组织，2018）。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援助支出实际可能只占 GDP 的 0.1%。

（7）尽职调查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风险巨大，和一带一路项目一样，世界银行也曾因此经历过漫长而艰难的时期。最近，世界银行还不得不取消了在乌干达 2.65 亿美元的道路建设项目。然而，鉴于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的炼油厂项目、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之间 40 亿美元的铁路建设项目的巨额经济损失，中国的观察家仍普遍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中没有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

无论是项目的固有风险，还是由于宏观经济和财政限制，必须承认的是，中国运营商不够重视客户的偿还能力问题。贷款人的疯狂借贷或将导致不够谨慎的借款人破产乃至违约，这并非没有先例，也并不局限于中国——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大量向贫穷国家提供国际贷款，最终都不得不在重债穷国的要求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下有条件豁免。主权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并非仅与单个项目相关。

5、政策影响

中国致力于同邻国及贸易伙伴建立更广泛、密切的联系无疑是合法的，其潜在意图仍是追求和平，其他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缔结贸易协定来加强双边贸易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即使不考虑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的情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仍将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 1.1%-2.2%（de Soyres 等，2018）。

要使一带一路倡议行之有效，需满足相关基本条件，明确目标，合理配置资源，明确项目的优先级并有选择性地加以实施，制定有可行性的计划，展开尽职调查并提高透明度。现有项目有部分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尤其是尽职调查、财政的可持续性调查方面漏洞较大，如何对既定项目进行改造、查漏补缺已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但，显然，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协调、透明的计划和目标。此外，对于中国当前国内外面临的巨大挑战，清晰的沟通也至关重要，未被明确定义的一带一路倡议给了反对者们煽风点火的理由和机会。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更好地评估项目的风险和成本。中国国内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承担更多的国际债务危机。

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是也应该是主要采取由中国发起倡议的形式，这有助于保持其在获得融资和执行速度方面的优势。然而，就像 2017 年同多边开发银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出的那样，同多边机构展开更系统的合作，利用双边或多边及民营企业资金，拓展融资渠道或将有助于中国开展大型一带一路项目；借鉴国际机构的相关经验或许有助于克服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缺点，提高透明度以帮助中国和跨国企业更好地决定其投资方向。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南部和东部成员国在内的众多富裕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都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在评估项目及附带的商业条件时，仍需保持谨慎，而应根据主要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定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明确优先事项。此外，由于资金必须偿还，不能仅仅考虑项目本身的内在盈利能力，还应充分考虑国家整体财政状况并对大型项目的支付能力进行评估。

对于同中国在影响力和市场方面存在竞争的大国而言，建议采取更理性的态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欧盟和美国在认为中国应当在提高透明度、改善尽职调查和保障措施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应当承认，一带一路倡议同他们自身的发展目标相互协同。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发展同样能够改善欧盟的商业环境和投资前景，甚至有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欧亚大陆桥对欧盟的巨大吸引力或许能够为欧亚贸易提供非同寻常的推动力（García-Herrero 和 Xu, 2016）。同样，拉美也能够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匪浅。

一带一路倡议还有效推动了各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非洲契约”（CwA）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6-2017年，二十国集团发起“非洲契约”倡议，旨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改善商业环境，促进私营部门对非投资，并已有10个国家签署了该倡议，但其目前仍缺乏私营部门投资响应，效果如何有待检验。

本文原题为“The Belt and Road Turns Five”。本文作者 Michael Baltensperger 是布鲁盖尔的一名研究助理，Uri Dadush 为布鲁盖尔 OCP 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国企暂缓全球化步伐

Derek Scissors/文 张舜栋/编译

导读：2018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速度显著放缓。作者全面总结并分析了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及在海外承包工程的分布情况，并对美国政府给出了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工程建设活动在 2018 年四季度显著下滑。其国有企业减少了对所有类别项目的海外投资，国企在海外承包的工程项目数量也有所减少。尽管目前为止，中国对外投资总量的下滑程度还相对有限。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企业和投资“走出去”的雄心正在面临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

就国外来说，一些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如美国、德国）对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愈发谨慎。而就国内来看，国企对外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的资金来源相对依赖中国政府持有的外汇储备。尽管中国政府依然持有海量的外汇储备，但其对外汇的使用需求也在快速升高。另外，回报率低迷的国内市场也推高了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面临越来越紧的外汇约束。

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CGIT），是目前学界汇总的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最完整的数据库。与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CGIT 的统计口径更全面、更合理。举例来说，商务部数据将中国香港视为境外投资目的地之一。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海外投资只是将香港作为资金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CGIT 识别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国，因此能够描绘出更加精确的双边投资关系。

CGIT 数据不仅汇总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还详细披露了全部 3300 笔交易情况。与 2017 年的火热场面相比，今年中国对外投资的交易笔数略有下降，而投资总额则大幅回落至 1100 亿美元左右，与 2014-2015 年水平持平。从去向来说，大多数对外投资流向了能源、冶金和运输业。另外，与海外并购相比，“绿地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比例明显上升。与初显疲态的国企对外投资相比，中国私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表现亮眼，其典型代表即是吉利斥资 90 亿美元入股戴姆勒集团，这笔交易使得德国成为中国 2018 年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国之一。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但中国对美投资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60%。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投资的总量也越来越多，但这主要是由一带一路覆盖国家数量的增加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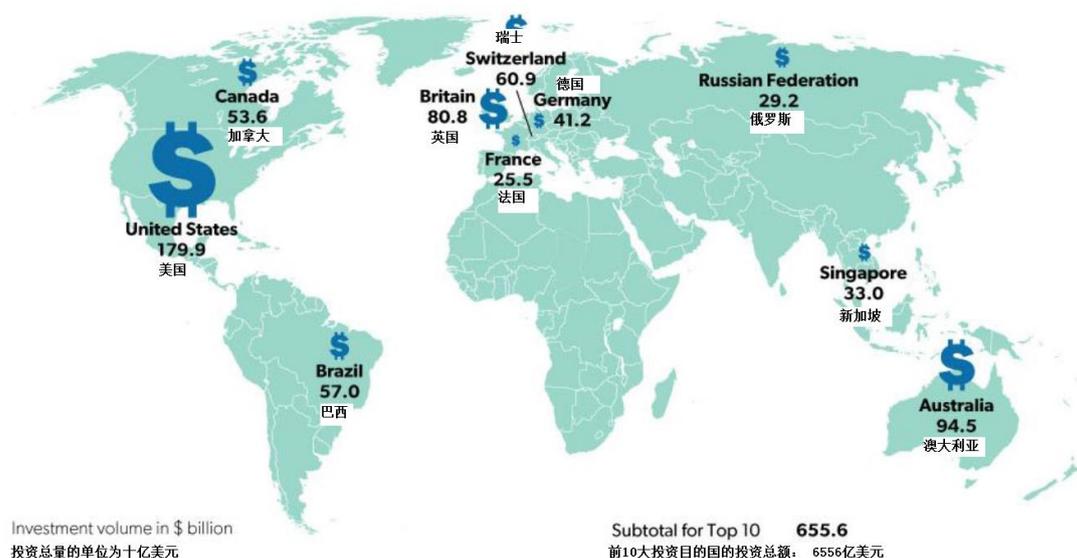
许多人容易将对外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混为一谈，但这二者存在重要的差异。投资牵扯到项目所有权的问题，因而可能相对复杂，而工程建设则不涉及所有权问题。自 2005 年以来，中国企业承接超过 1 亿美元的大型海外工程越来越多。从 2005 年至今，CGIT 共记录了总价值约 8000 亿美元的中资企业承包的海外工

程。由于工程合同的披露往往存在一定迟滞性，因此 2018 年的统计数据还暂不完整，但去年中国在超过 60 个国家里都有价值至少一亿美元的海外工程项目。从行业分布来看，这些工程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运输业，不过近年来大型能源项目的数量正逐年减少。从项目所在国家来看，绝大多数海外工程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去年项目数量增长最快的是以埃及为代表的几个中东国家。自 2013 年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资企业已参与了沿线国家总额超过 3500 亿美元的工程项目。

当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正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2017 年，中国的对美投资总额首度下滑。到 2018 年，中国对欧洲国家的投资也开始出现回落。另外，一些国家开始对中国投资的长期目的产生疑虑，也对与中国不平衡的贸易、投资关系感到失望。其中，一些国家正转向美国。近年来，美国对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海外投资行为愈发敌视，对涉及中国的技术转让行为也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政策。但笔者认为，美国目前做的还远远不够。美国应尽快出台有力措施，有效应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知识产权问题、数据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等。同时，其他正常的中美经贸合作还应继续深化前行。

从投资去向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是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目的地——在过去十三年间，中国前十大对外投资国中只有两个是一带一路国家（见图 1）。尽管美国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中国 2005-2018 年间第一大投资目的国，但在考虑了各国经济总量和人口后，中国似乎并没有体现出赴美投资的强烈偏好。近年来，在一些特大型投资/海外工程的驱动下，德国（吉利入股戴姆勒）、尼日利亚（大型水电项目）、智利（大型矿业并购）等国成为了中国投资的新兴目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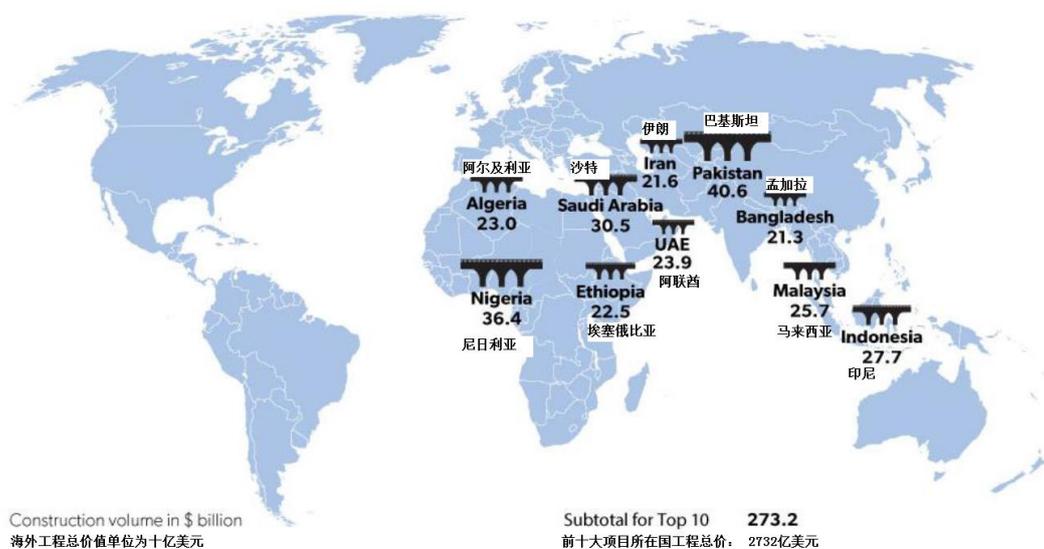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对外投资前 10 大目的国：2005-2018



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比明显上升，达到了对外投资总量的40%，与2017年相比上涨了一倍多。但这个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一带一路成员国数量的扩张。在发起之初，一带一路只涵盖了64个国家，而去年这个数字上涨到了125个国家。显然，数量的增长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总量的扩张。此外，中国对美国、欧洲国家投资总量的下降也导致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比例的上涨。

当然，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中国企业参与的工程承包总额远远高于投资总额。需要指出的是，尽管CGIT已经记录了超过8000亿美元规模的中资企业海外承包工程，但实际规模肯定高于这个数字。这是因为我们的数据没有记录2005年以前的海外工程，另外在许多国家（往往是较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工程活动信息都没有得到完整的披露。与对外投资相比，海外工程的典型特征是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图2展示了中国海外工程项目的主要所在国。与图1的投资目的地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吸引海外工程的国家往往是更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另外，中资企业承包海外工程的前10大项目所在国，无一例外全都是一带一路国家，这当然不是巧合。我们发现，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吸引的中资企业承包工程总额已经达到了中国投资总额的两倍左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依然有许多一带一路研究者“只见投资而不见工程”。除我们的数据外，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出了类似的规律。

图2 中国企业海外承包工程的前10大项目所在国：2005-2018



2018年，埃及、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吸引了最多的中资企业工程项目。此外，孟加拉、阿根廷和尼泊尔等国也非常活跃。与投资不同，参与海外工程承包的中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国企素来以能够在条件恶劣、缺乏短期盈利前景的地区承包工程闻名，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显然，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不大可能系统性动员其国内的私营企业，在工程承包市场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系统性的较量。

面对中国企业迅猛的国际化趋势，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其中首要的是对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流程进行改革。但是，笔者认为仅仅否决有问题的中资并购案还远远不够，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手段。举例来说，如果有证据显示某企业侵犯了美国的信息安全，那美国政府应当对这家企业进行全球制裁。如果有企业通过非法手段盗取了敏感技术，美国政府应对其实施市场禁入，以示惩罚。当然，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方案。要真正落实这些“有力手段”，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及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通力合作，并有效掌握企业的违法证据。显然，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

另外，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当前关注的一些议题已经显得过时。举例来说，要求中美两国各自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就是缺乏意义的：美国不可能向中国开放敏感的高科技行业，而美国企业也缺乏动机进入中国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另外，在知识产权窃取和侵犯隐私数据问题上片面关注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私营企业同样可能存在类似违法行为。

总之，尽管绝大多数中国对美投资都是合法、无害的，但确实存在一些中国企业在各个方面违反了美国法律，侵犯了美国企业及公民的权利。虽然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虽然过去两年中国对美投资已经大幅下降，但个别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没有减少。

本文原题为“Chinese Investmen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op Globalizing, for the Moment”。本文作者 Derek Scissors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资深研究员，CGIT 数据负责人。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Longmei Zhang and Sally Chen/文 安婧宜/编译

导读：中国数字化经济在世界处于中间水平，但在关键行业中国是数字行业领导者，如电子支付、电商服务、云储存、ICT 出口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得益于用户需求、政府支持、规模优势。而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与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再平衡、改变市场结构与不平等现状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本文也对中国数字化经济发展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建议。编译如下：

1、全球背景下中国的数字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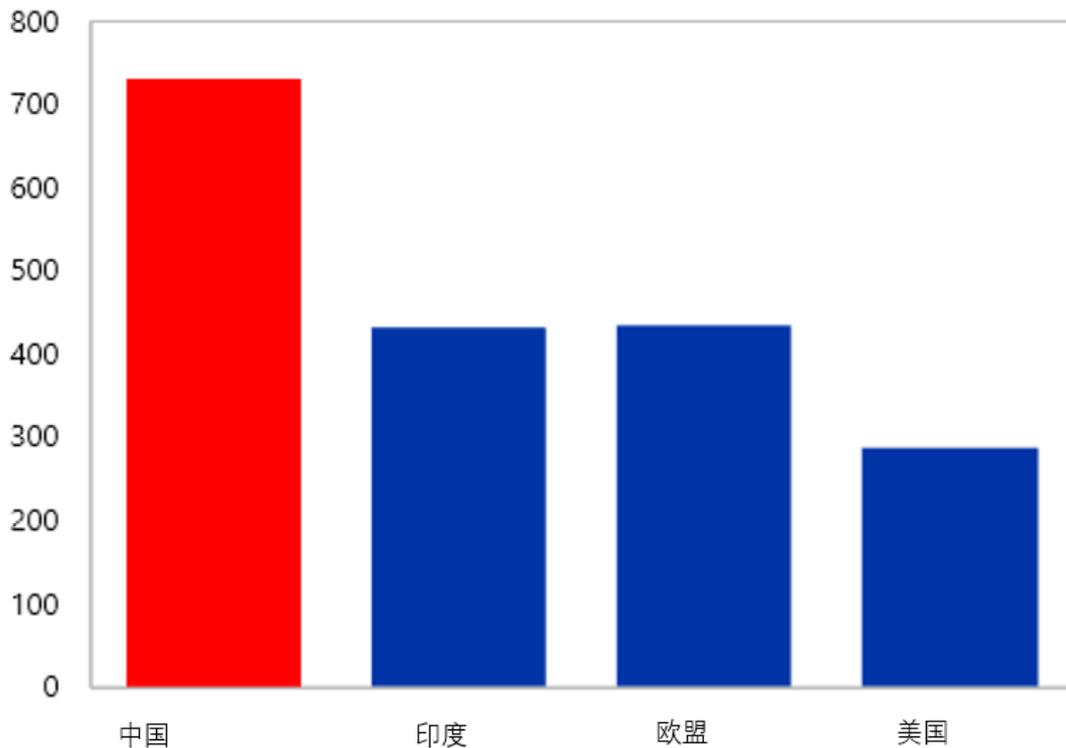
中国总体数据化发展水平在世界处于中间水平。根据 OECD 定义，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例为 6%，与日本、韩国的 8%-10% 相比，日韩两国的数字经济更加发达，在总体经济中发挥显著作用。而在更广泛的定义下，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的 30%，而这一数字在美国则为 59%，在日本为 46%，而在巴西、印度和南非都在 20% 左右。根据世界银行数字化指数，中国在 131 个国家中排 50 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指数，中国在 139 个国家中排 59 名。

但是，在关键行业，中国是全球数字行业领导者。虽然整体数字化水平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在一些关键产业中仍领先世界。这些行业包括电商服务和互联网金融。尽管中国数字经济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中国的已经在一些细分行业中领导世界。如电子支付、电商服务、云储存、ICT 出口等。

中国也成为世界数字化技术的主要投资者。中国的风投产业发展迅速，并逐渐加大了对数字产业的关注。根据麦肯锡的估测，2011 年到 2013 年间，中国风投总规模为 120 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6%。而到了 2014 至 2016 年间，中国风投总额提高至 770 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 19%，其中 380 亿美元为海外投资。

中国在数字领域的成功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相对较多人口的金融需求亟待满足。其次，政府政策对于数字发展在很多方面给予支持。第三，规模优势和顾客成为成功的关键。中国的数字经济体系由所谓的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发展建构，在多行业融资并收集客户数据，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图1 互联网用户（百万）



2、中国数字发展的演变

中国在近些年来经历了数字化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的规模从2008年的15%发展到了2017年的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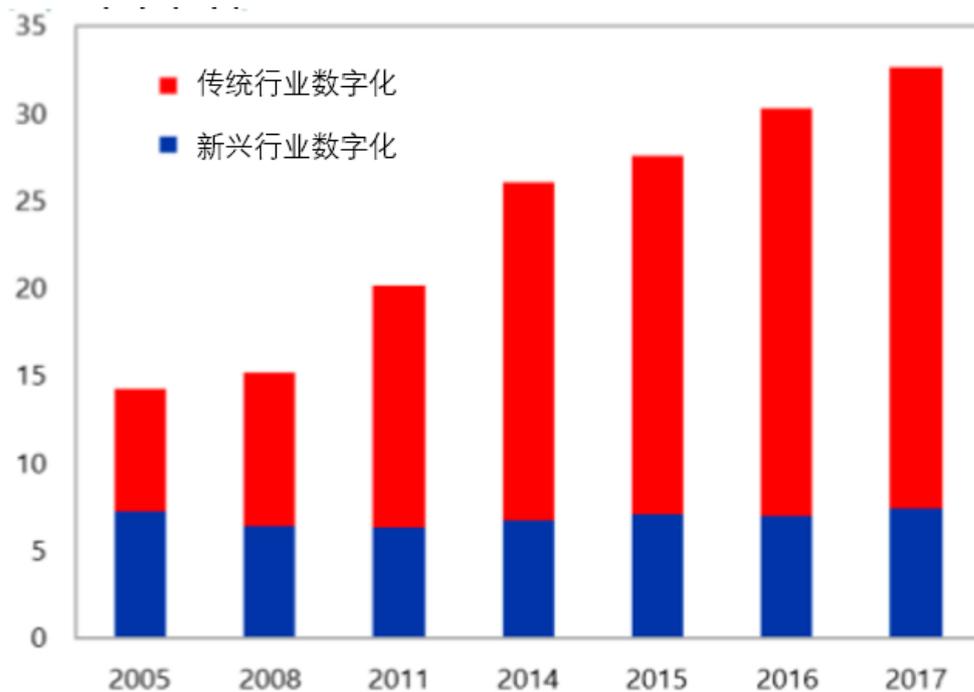
但是，各省份数字化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较大。数字化在不同省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反映了中国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不同阶段。比如，北京和上海的数字经济占总GDP的45%，而在河南省，数字经济规模仅为GDP的15%。

各领域数字化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总体来看，服务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最高。而一些行业则相对落后。农业的数字化程度仅为7%。

3、数字化的实际影响

生产力。理论上，从发展框架来看，数字化可以促进生产力。而实践经验证明，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10年间，数字经济的发展与TFP发展紧密联系。回归表明每一个百分点的数字化经济发展会使得GDP提高0.3个百分点。

图2 中国数字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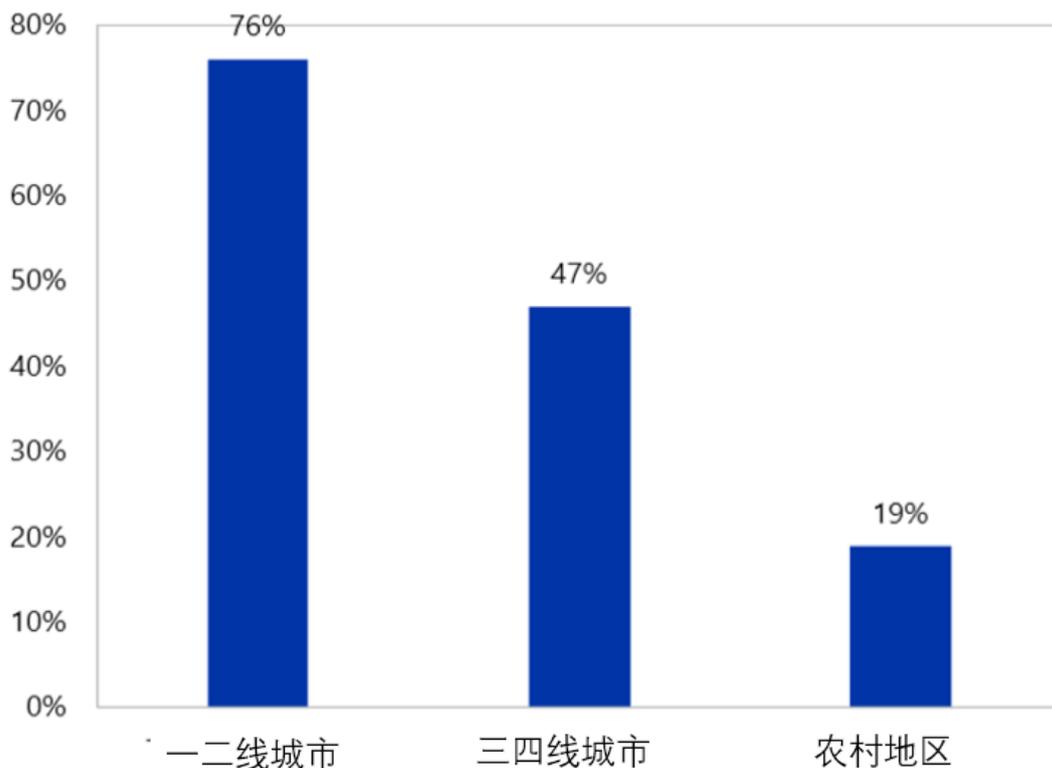


数字化可以从以下方面促进生产力提升：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就业。数字化在新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电商服务和分享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的就业引擎。但同时，数字化又造成了大量工作的消失。同时分析这两种影响，我们会发现数字化对就业的净效应是正面的。市场结构。数字化对市场结构会产生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间商的消失，传统企业中小企业的增加，以及平台的寡头垄断。经济再平衡。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再平衡。数字应用的迅速渗透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发展。而那些巨头应用程序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娱乐、餐饮、教育和医疗。数字化也可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使得二氧化碳的追踪更加容易。不平等。数字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是确定的。一方面，数字化可以促进减少平困，尤其是可以链接偏远地区的供应商与大城市的消费者。在另一方面，数字化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高水平劳动力的收益，会潜在地加大贫富差距。结论与政策建议。数字化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充满危机。数字化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再平衡，在新领域创造就业。但另一方面，数字化也会扰乱传统工业，带来失业。

政府应该扮演好领导角色，最大化数字化的利益，并控制数字化带来的风险。政府措施如下：

1、出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数字化最关键的风险是它可能会扰乱一些领域的劳动力市场。为达到平缓的劳动力转移，政府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吸收劳动力再就业。2、加强社会安全网络。为受到影响且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力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从而保证最低生活标准。3、制定竞争政策。政策应该支持公开网络和促进竞争。4、制定全面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从而缩减政策鸿沟。5、数据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者应该和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从而促进在互联网金融体系下的数据与消费者权益保护。6、建立数字政府。政府应该通过数字化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7、继续支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化的飞速进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持续不断的设施升级，所以需要政府不断投资。8、出台教育政策。提高对 ICT 教育的关注。

图 3 网络渗透率



在设定全球化标准中设立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应该在联合其他国家设立全球标准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本文原题为“China’s Digital Economy: Opportunities and Risks”。本文作者 Longmei Zhang and Sally Chen 是 IMF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 2040 年人口形势展望

Nicholas Eberstadt/文 吴克谦/编译

导读：目前已经可以对中国 2040 年的人口状况有相对可靠的预测。在数量方面，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并在此后加速下降；在年龄结构方面，65 岁以上人口将呈爆炸式增长，老龄化迅速。这些趋势预示着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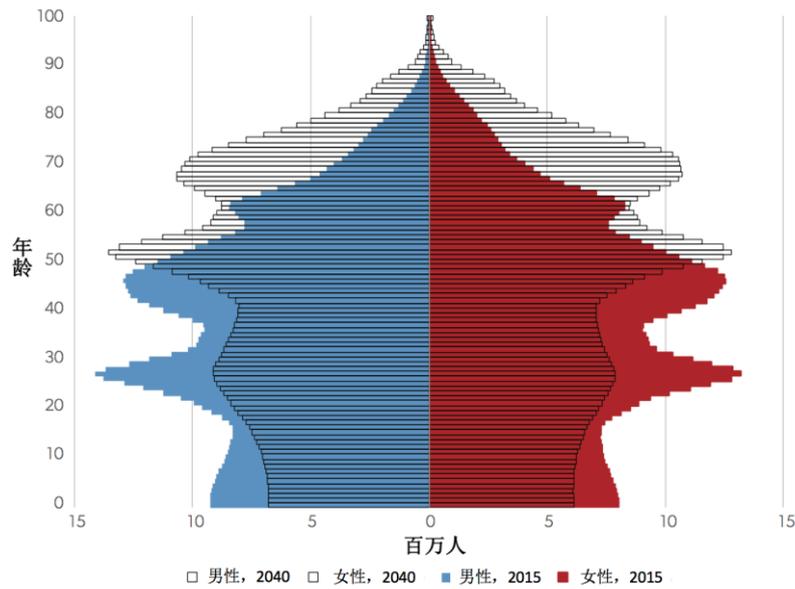
我们已经对中国 2040 年的人口状况有了相当可靠的了解，因为将在 2040 年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出生。因此，尽管人口预测存在不确定性、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也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数据问题，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有一定的把握，来描述中国人口即将出现的趋势，并评估其影响。

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与其长期“少子化”现象有关，在本文撰写之际，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并可能延续到 2040 年。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将在未来十年达到顶峰，并在此后加速下降。除了从根本上重新划分国家边界外，中国已经没办法阻止人口减少了。

中国即将到来的人口减少将同时伴随着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2015 年至 2040 年，中国 50 岁及以上人口将增加约 2.5 亿；50 岁以下人口的减少幅度大致相当。这意味着中国将经历人口的快速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将呈现爆炸式增长，而劳动年龄人口（通常定义为 15-64 岁）逐渐减少。尽管中国政府有一些政策选择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源萎缩，但这些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并预示着中国“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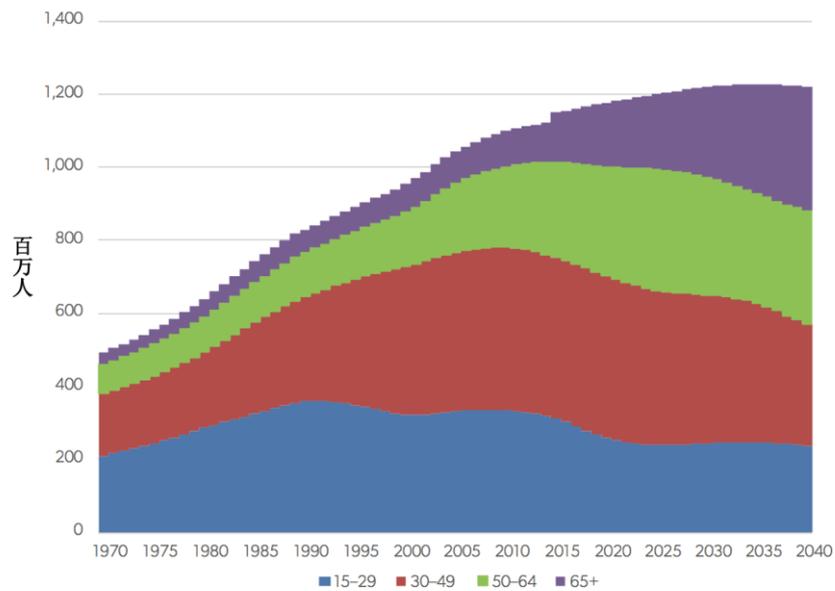
此外，目前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以及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不可能阻止的一些变化，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具有潜在巨大破坏性的影响。其中包括：（1）独生子女政策时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将带来“婚姻挤压”，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日益增多的“准新郎”组建家庭的几率；（2）户籍制度下的“中国特色索韦托”城市化问题，将使数亿的城市外来人口处于官方劣势地位；（3）中国家庭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先前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性和国家安全，尽管这种影响很难预测。

图1 中国人口结构（2015 和 20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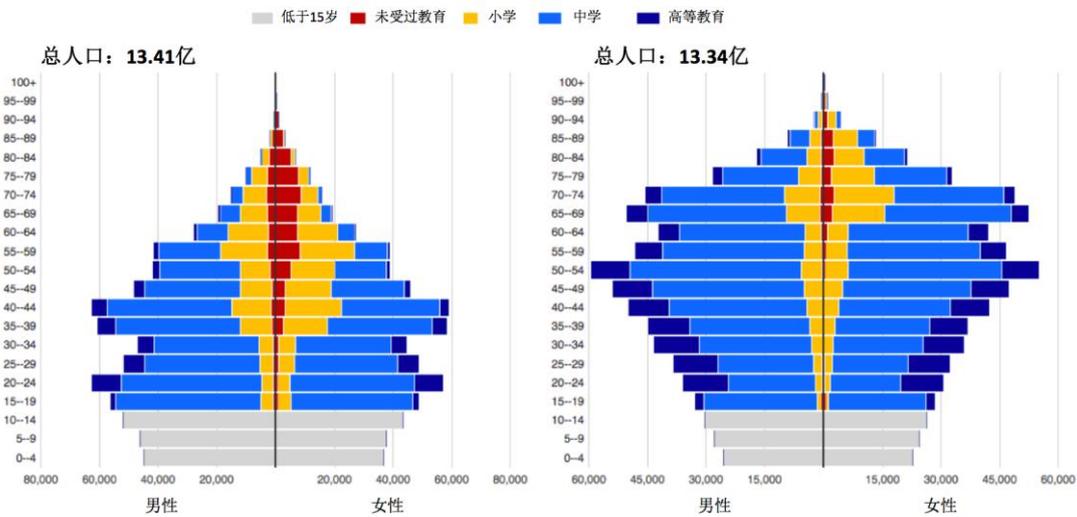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图2 中国人口结构（15岁以上，按年龄组划分），1970-20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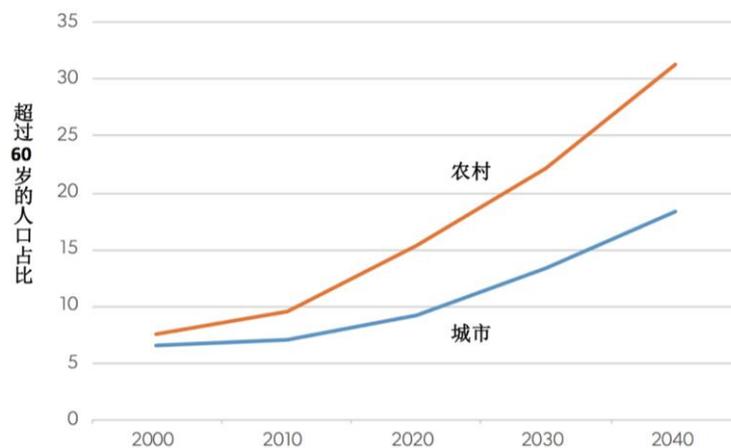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图3 中国人口结构（按教育程度划分），2010年（估算）和2040年（预测）



来源：Wittgenstein Center, 2018, <http://www.wittgensteincentre.org/en/index.htm>.

图4 中国城市和乡村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2000-2040



来源：Yi Zeng et al., Household and Living Arrangement Projections: The Extended Cohort-Component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U.S. and China (New York: Springer, 2014), 19-48.

本文原题为“China’s Demographic Outlook to 2040 and its Implications: an Overview”。本文作者 Nicholas Eberstadt 是 AEI 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019 年全球经济预测

Michael Baltensperger/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本文为 2019 年欧洲、美国和亚洲的经济表现展望。文章首先回顾了对欧元区的评论和预测，许多评论人士预计，由于不确定性继续抑制依然强劲的复苏，欧元区的表现将低于潜在水平。此外，其他地区经济也各自存在风险。编译如下：

欧洲央行 (ECB) 在其《经济公报》中预计，受周期性力量和贸易紧张局势影响，2019 年全球经济将减速。对欧元区而言，该报告预计实际 GDP 增速为 1.7%，通货膨胀率为 1.8%。此外，政府预算赤字也将增加。

英国《金融时报》(FT) 从欧元区观察员那里收集到的一系列经济预测数据较为乐观。在 24 位受访者中，半数人预计欧元区在 2019 年的增长率将超过 1.5%。其余更加悲观的预测主要缘于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美国进一步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威胁以及中国需求的减少。

大多数受访者承认，反欧盟民粹主义者可能将会在 5 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但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将对 2019 年欧元区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反欧盟民粹主义者仍属少数，大部分人仍将支持传统党派。最后，由于大多数受访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低于欧洲央行预期，欧元区最早的加息时间预计将出现在 2019 年底或 2020 年。路透社报道，由于德国工业产出数值令人失望，货币市场预计 2020 年年中之前不会加息。

许多评论人士强调，欧元区经济仍然强劲，如果贸易、欧洲选举和英国脱欧等事件的不确定性有所缓解，他们预计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有所回升。然而，即便经济增速回升，也依然存在许多下行风险。

首先是中美贸易战方面：在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欧洲出口将放缓。Alicia Garcia-Herrero 认为，即使中美贸易停战，部分贸易也将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因为休战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对欧洲出口存在挤出效应。除此之外，美国还可能在 2019 年 2 月的商务部报告中提出对欧盟出口汽车加征关税。

Shamik Dhar 在南华早报上写道，欧元区的金融风险仍然很大。由于欧洲的银行仍然拥有欧洲主权债务，金融部门风险仍有可能在欧洲范围内蔓延。Patrick Jenkins 批评欧盟主权债券的零风险权重较高，仍激励欧洲的银行大量持有本国债券。这显然增加了欧元区再次陷入危机的风险。Martin Wolf 认为，全球债务水平不断增加和持续负利率使欧洲几乎没有空间来处理经济放缓，即便是温和的放缓也不行。此外，由于全球政治秩序衰退和全球经济条件分歧，协力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将不可能实现。

由于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商业周期交织在一起,《经济学人》的经济编辑 Henry Curr 仔细地研究了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他指出,美联储加息虽然迄今为止管理良好,但由于货币政策制定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它仍是美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虽然所有类别的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但投资级公司债券中最低评级(占有投资级公司债券的 45%)的部分可能会成为一种特殊风险,因为只需一次降级就会将他们带入“垃圾级”。

此外,进一步加息可能会导致浮动利率债务的借款人以及必须使用以美元计价债务的新兴市场陷入困境。新兴市场的严重动荡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者逃往安全资产,进而继续迫使美元走强。由于 2019 年几次加息带来了强烈的预期,美联储有可能在新的一年里放弃加息,不再大幅收紧货币。

Jeffrey Frankel 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在 2019 年放缓,减税的刺激效应消退和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例如贸易战和政府关闭)可能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他指出,与现有通货膨胀率或泰勒规则所建议的理想利率相比,美国的利率仍然非常低,因此预计美联储将进一步加息。虽然他也承认提高利率可能给新兴市场带来困难,但他强调,提高美国利率意味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这“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并非坏消息”。

Leo Abruzzese 认为经济问题在 2019 年酝酿。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通胀率提升,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但是,美国较高的利率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经常使用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成本,并使得通过债务筹集资金变得更加昂贵。由于全球债务比 2007 年高出 20%,利率上升也将给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带来麻烦,这些公司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增加债务而过去利率很低(今后利率升高会带来企业融资压力,需求不振也带来偿债风险)。从好的方面来看,银行资本化以及企业和政府的风险管理自 2007 年以来有所改善。然而,由于美中贸易战将抑制企业投资,中国消费正在放缓,压力迹象明显,这预示着未来可能存在麻烦。

中国经济在 2019 年放缓的趋势得到了中国政府和国际观察员(例如世界银行)的广泛认同。中美贸易战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经济学人》亚洲经济学编辑 Simon Rabinovitch 认为,中美贸易战不会很快结束。美国谈判代表为提高关税而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与中国政府认为的向价值链上游发展至关重要的要求截然相反。相反,中国很可能会对美国的要求坐视不理,放松经济中的金融约束,以抵消出口减少的影响。

但 Takahide Kiuchi 在《日经亚洲评论》中写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可能会大幅降低中国的 GDP 增速。假设中美之间为期 90 天的贸易战停火不会结束两国间的关税升级,中国的 GDP 可能会受到高达 1.4% 的打击。这种放缓可能引发中国投资产品违约,进而可能增加银行倒闭的风险,可能导致银行贷款减少,并引

发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再降低 0.5%，届时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 4.5%，而非贸易战和解后预计的 6.4%。

除了贸易紧张外，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其他令人不安的迹象，最近的一次是苹果首席执行官写的一封信，警告说苹果公司利润可能低于预期，部分原因是由于无法预料的“经济减速幅度，特别是在大中华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减少（可能是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似乎特别令人担忧。但是，Uday Khanapurkar 在《外交官》中写道，中国经济不应仅仅依据制造业指数判断。中国在催生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数字服务公司方面有着卓越的记录，他认为，观察家们在“敲响中国经济的死亡丧钟”之前，需要考虑到中国服务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为应对经济减速的迹象，中国政府宣布减税、增加财政刺激和减少金融业的制约因素。虽然这些措施预计将在 2019 年推动国内消费，但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企业不可持续债务的担忧。因此，Panos Mourdoukoutas 在《福布斯》中写道，根据一些估计，中国的债务率可能高达 300%，这让他想起了希腊债务危机。由于中国政府往往既是贷款人，也是借款人，信贷风险集中，对 2019 年的中国和世界经济构成了最主要的风险。

不过，Simon Rabinovitch 认为，经济放缓还可能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如平衡各省之间的税收收入，降低进口关税，以及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业。上述举措并不能阻止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 6%，但将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本文原题为“What 2019 Could Bring: A look Inside the Crystal Ball”。本文作者 Michael Baltensperger 为 Bruegel 研究助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和能源经济学。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私人债务的公共成本

Samba Mbaye, Marialuz Moreno Badia, Kyungla Chae /文 张子萱/编译

导读：金融危机出现以后，公共债务积累的危险得到了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私人债务的过度积累却很少受到关注。本专栏记录了一种未被关注的私人债务的化解方法。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债务的反周期增长转移私人债务，缓解家庭与企业个体的债务压力。即使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转移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编译如下：

全球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破坏让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私人债务肆意扩张的危险。在最近的研究中，私人杠杆率过高与金融风险的增加、经济复苏乏力，中期经济增长偏低间的关联都已被证实。本文的研究主要探讨了高私人杠杆的财政成本，这种财政成本部分体现在危机后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急剧上升。然而，目前的证据和政策辩论主要与金融危机和援助银行业的成本有关。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认为，无论在杠杆后周期的危机，还是有序的去杠杆化过程中，私人债务过度积累都会出现外溢现象，即导致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研究结果表明，私人债务的外溢效果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实现的，而非因为救市所导致的政府负债增加。基本机制的工作原理如下——每当私人部门债务出现过剩，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就会抑制经济活动，政府需要借来更多的资金来提振经济。这是历史上不断进行的一个过程，过高的私人债务通过这个机制拉高公共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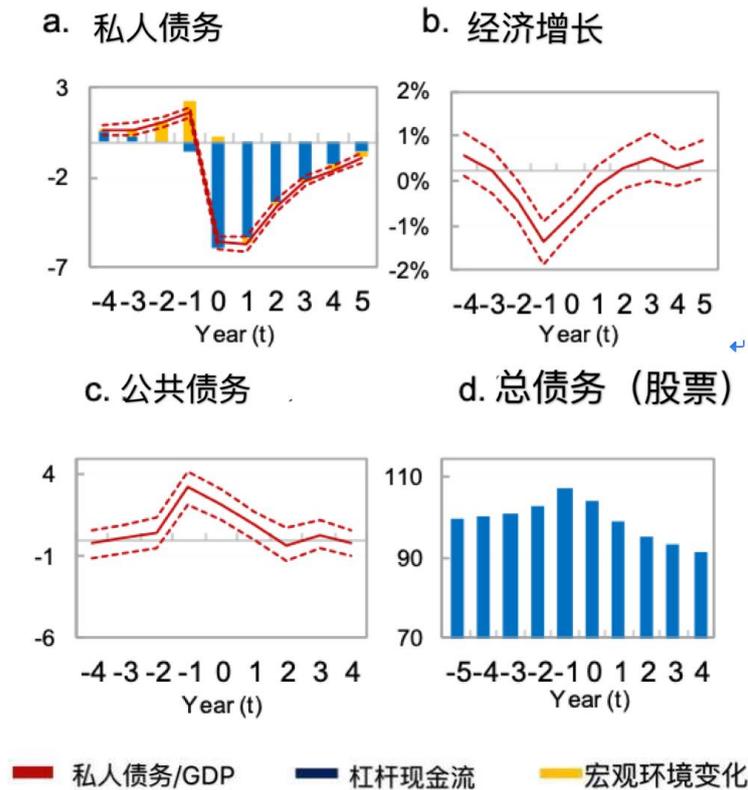
来自 190 个国家的债务数据

通过对 1950 年来 190 个国家私人与公共债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对现在主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外的私人去杠杆化进行研究。

对私人杠杆的解析

我们将私人去杠杆程度定义为私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历史峰值与低谷之间的差，并识别几十年间不同收入水平的 535 次私人去杠杆化政策。下图显示了私人去杠杆化周期所在的宏观经济动态及其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为方便观察，我们将私人债务与 GDP 比率的变化分解为利率变化（宏观变化）和剩余部分（杠杆的资金流）的变化。

正如预期的一样，私人债务比率在去杠杆后出现下降。然而，仔细观察还能发现一个现象——虽然债务比率在去杠杆化事件发生前增速加快，但杠杆现金流（蓝条）的增长是逐渐减缓的，并在去杠杆化开始前一年变成负值。这表明，在私人债务比率下降前，就已经有部分债务开始被偿还了。



由于“宏观变化”（图1，图A，黄条）的影响，特别是GDP下降（图B），早期的去杠杆政策可能看起来没有效果。GDP的减少抵消了债务的收缩，反而推动了债务比率的上升。但这种衰退是暂时的，经济增长在去杠杆一年后恢复正常。

另一方面，私人去杠杆的过程中，公共债务的增长往往更快（图1，C组）。在去杠杆开始的前一年，公共债务就已经出现了激增，随后随着经济的回暖和去杠杆的推进，公共债务逐渐得到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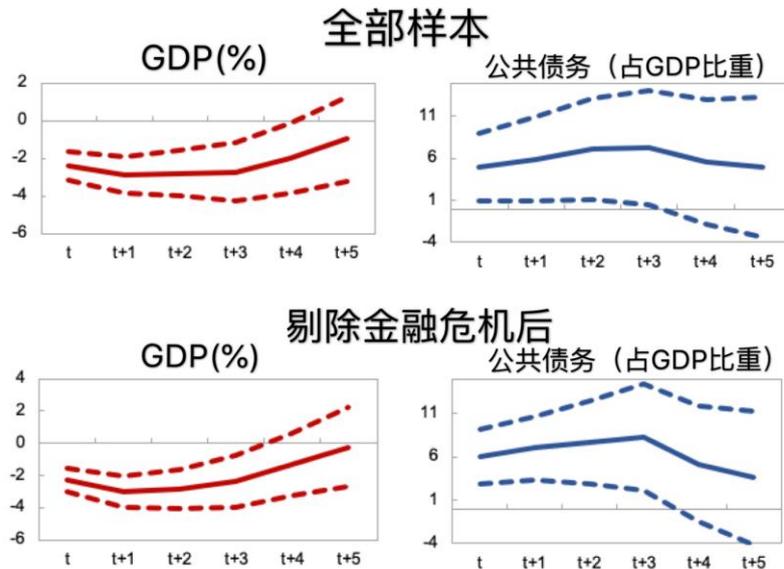
最后，债务总额在私人去杠杆前上升，并很快稳定下来，最后下降。单纯的私人去杠杆虽然总是能够成功，但一定存在一部分私人债务被公共债务“替代”，不过最终债务总量是下降的。也存在一些特例，我们的研究记录了一种特殊的去杠杆，被称为“无增长”，在去杠杆结束时，总债务反而更高。这种情况的概率约为四分之一。

私人债务向公共部门的溢出

为了确定这些历史现象是否是由于过量的私人债务的向公共部门溢出造成的，我们需要确定私人去杠杆与公共债务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

基于倾向加权回归调整（IPWRA）模型所得出的结果，我们在图2中展示了私人去杠杆对经济增长和公共债务的影响。它显示了在t期进行的私人去杠杆对未来五年的GDP与公共债务的影响。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私人去

杠杆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公共债务增加。在去杠杆开始后 3 年中，公共债务平均占 GDP 的 7.2%。



这不仅是一个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剔除金融危机时期从样本中剔除后，我们依然会得到类似的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危机，私人去杠杆化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公共债务增加。

结论

对上述发现的解释有很多，它们甚至引出了更多的问题。一种相当气人的解释是，我们都在背地里为旁人的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务进行担保。政府充当“最后的债务人”，并以所有纳税人的名义发行新债务，再通过去杠杆化过程支持经济活动。无论将此看作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多数人将会同意，在分析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时，我们必须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债务进行总体性考虑。

本文原题为“Bailing out the People: The Public Cost of Excess Private Debt”。本文作者 Samba Mbaye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科经济学家。Marialuz Moreno Badia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科副主任。本文于 2019 年 1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历史终结的终结？

James Dobbins/文 王梦瑶/编译

导读：作者认为，历史的终结在二战后即 1945 年就到来了，因为在那之后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小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而特朗普当下带领美国从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的自由世界秩序中撤退，则意味着这种“历史的终结”的终结，最坏的结果是世界重回历史——繁荣与萧条的古老周期和频繁的重大战争。编译如下：

近来，特朗普总统“美国至上”言论、欧洲的类运动、俄罗斯复仇主义者运动以及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关于民主的健康运作与自由世界秩序的辩论。

1989 年，福山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将迎来“历史的终结”，意为代议制民主胜过了其他所有形式的政府。文章发表后十年之内的情形似乎正如他在文章中说的的那样，因为民主在当时席卷了中欧和东南欧、拉美和亚洲大部分。然而近年来，其中的一些民主国家已经变得步履蹒跚。尽管很少有彻底崩溃的，但民主浪潮似乎已经开始减退。

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历史的终结”在 1945 年就来临了。从那时起，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小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尽管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商业周期变得温和而有节制起来。随后的七十年见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全世界半数人口成为中产阶级。

这些成就是基于两种基本的、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你不应该贪图邻居的领土，并应该向所有人平等地开放市场。这些规范得到了众多战后机构的支持：联合国、北大西洋条约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如今的世贸组织。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规范的背后，有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吸引力的支持。

因此，很合理地要问：如果美国不愿继续承担领导责任，那么这个只需是否还能存续？替代方案是什么？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中国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产生了新秩序——也许是和平的，但无助于个体自由。而更糟糕的结果将会是回归历史——繁荣与萧条的古老周期和频繁的重大战争。

想知道国际秩序崩溃时会发生什么，只需回想二十世纪上半段，即全球大衰退和世界大战的时期。文明在前核时代幸存下来。但是，伴随着至少九个核大国的存在、网络战、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的潜在攻击性应用，人们在如今不能那么自信了。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总统的国家安全顶级顾问麦克马斯特和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写道，“世界不是一个‘全球社区’，而是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和企

业之间争夺优势的竞技场。”这种霍布斯式愿景的作者是白宫中的两位主要全球主义者，二者中没有一个长久任职。

从那时起，特朗普就在不断地从其的最初的基础削弱战后秩序，其中以北约和欧盟为代表。他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征收国家安全关税，质疑与跨大西洋联盟的持续相关性，并对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持久性表示怀疑。颠覆了几十年以来的美国政策，特朗普为脱欧欢呼，并在敦促默克尔总理与美国就双边贸易进行谈判的同时，鼓励德国也离开欧盟。

特朗普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是一个双边主义者。他以一国之力一次实现贸易平衡的努力与战后贸易体系的核心原则和密尔、李嘉图的经济共识背道而驰。尽管美国赢得了大多数案件，但特朗普攻击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甚至威胁退出组织。

取消过去讨价还价的以上及其他举措，代表了美国正在从基于规范和市场开放、并且有民主倾向的秩序中撤退，而这种秩序是美国自 1945 年起创造并一直支持的。大多数步骤是可逆的，一些损害可以被撤销。但是，如果这种国际秩序状况持续下去，结果可能是回归历史，许多人的生活将会再次变得“讨厌、野蛮和短暂。”

本文原题为“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本文作者为兰德公司外交与安全事务杰出主席 James Dobbins，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本文刊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兰德公司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面对经济改革，中国不能再优柔寡断

Yu Jie (Cherry) / 文 凌枫 / 编译

导读：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行动比话语更重要。共享繁荣和经济持续改革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巩固党的合法性、确保党生存的必由之路。编译如下：

12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邓小平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召集中共最重要的干部、企业家、奥运冠军等参加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揭示了下一阶段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改革议程。

这大会在动荡不安的 2018 年年末举行，中国发现自己正在应对经济放缓，同时还在与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伙伴——美国，进行着一场意料之外的持久贸易战。这两个困境在本质上是相互交织的。

习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没有为这两个燃眉之急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但他传达了两个明确的信息。首先，中国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前两任主席都没有像习一样公开、高调地谴责过那场既是国之殇亦是民之痛的十年内乱。

第二，中国必须继续改革。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中国能更好地未雨绸缪，以应对自主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跌宕起伏。

然而，目前极为重要的是，尚不清楚为了推进习所设想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将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相反，习在讲话中指出，邓的改革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也就是说，党领导一切。

党的中心地位引起了一些混乱，并且反映在国内经济的调整中。习提倡供给侧改革，但却导致共产党干预市场。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但却加强了党委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经营决策的控制。

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在改革方面，行动比话语更重要。迄今为止，习所希望实施的多数大胆改革计划都没有实现。他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推动紧急实施经济改革。在这个时代，怎么做和做什么一样重要。

面对大刀阔斧式改革和缓慢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快速发展和渐进式改革之间的两难，他既承诺加速发展，又承诺加快改革。在某些方面，习看起来像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试图通过她脆弱的退欧协议来协调不可调和的结果。

习不能拖延迫在眉睫的改革。对于他和政治局的同志们来说，重要的是防止失败观念在中国民众中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旅程，这不仅会加剧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问题，还会让两国重新陷入敌意——这是邓 40 年前努力避免的。

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仅将中国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而且将其视为世界另一种政治体制的主要捍卫者，并对美国敏感的技术垄断构成威胁。北京方面的混乱反应，暴露出一个神话：超权的主席管理一个注定要实现不可阻挡之增长的经济体。

40年前，中美两国各自怀着明确的目的正式建交。邓看到了重新向世界介绍中国、与苏联正式决裂的机会之窗。而美国相信，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国际秩序，将从根本上西化中国。

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是全球增长的引擎，但在政治上与美国的距离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期。鉴于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和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度，几乎不可能将它们分开，但恢复政治互信是不太可能的。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世界各国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中国领导层最近的许多决定让一些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感到失望，但重要的是应认识到，中国仍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在寻找阻力最小的道路。即使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似乎也认识到，一个更加动荡的中国不会是一个更易相处和合作的伙伴。

我们只能希望，今后习的政策将建立在对1978年邓“实事求是”原则的创新解读之上；应该坚信，共享繁荣和经济持续改革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习来说，更是巩固党的合法性、确保党生存的必由之路。

本文原题为“China Can No Longer Afford an Indecis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Reform”。
本文作者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地区项目研究员 Yu Jie (Cherry)。本文刊于2019年1月2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家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